

# 沙陀来源新论

王旭送

(新疆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1)

**摘要:**沙陀原是唐朝时期活动于我国西北地区的一个弱小部族。沙陀没有记录本族历史的传统,而相关史料也缺乏准确、详细的记载,最终导致后世在沙陀来源认识上出现差异。笔者认为,学术界占主流的“沙陀源自西突厥别部处月”的观点是错误的,沙陀源自于射脾部。

**关键词:**沙陀;族源;处月;射脾

**中图分类号:**C9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245(2008)04-0056-06

沙陀是唐朝时期崛起于我国西北地区,并在五代时期建立三朝一国四个政权<sup>①</sup>、风云一时的一个部族。但是对于其来源,由于历史记载的缺乏,加之“夷狄无文字传记”,学界一直存在较大分歧。笔者不揣孤陋,愿就沙陀的来源问题略陈拙见,以求正于时彦。

## 一、学界观点综述

关于沙陀的来源学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沙陀源自回纥部。五代孙光宪持此说。其《北梦琐言》云:“河东李克用,其先回纥部人,世为蕃中大酋,受唐朝官职。太宗于北方沙陀碛立沙陀府,以招集降户。”<sup>②</sup>回纥和沙陀关系比较复杂,他们之间经历了唐朝平阿史那贺鲁时的敌对关系,到安史之乱及吐蕃取西域时的同盟关系,再到沙陀内迁后的重新敌对的关系<sup>③</sup>。但沙陀与回纥之间的复杂关系并不能说明沙陀源自回纥。对此,樊文礼通过详细分析对沙陀来源回纥说进行了驳斥<sup>④</sup>,兹不赘言。

第二,沙陀乃月氏别种。清代和宁持此说。其《三州辑略》云:“沙陀金山,月氏别种西突厥之苗裔,本号朱邪,世居金沙山之阳,蒲昌海之北。”<sup>⑤</sup>此

种观点立论的前提是,沙陀、处月为同一部落。根据有的学者研究,处月部属古月氏种<sup>⑥</sup>,但倘若证明沙陀、处月非同部落,则该观点不攻自破。关于这一问题,容下详述。

第三,沙陀源自铁勒之同罗、仆固部。陶懋炳、韩国磐持此说<sup>⑦</sup>。持此种观点的人主要依据《旧五代史·唐书·武皇纪》所记。其云:“太祖武皇帝,讳克用,本姓朱耶氏,其先陇右金城人也。始祖拔野,唐贞观中为墨离军使,从太宗讨高丽,薛延陀有功,为金方道副都护,因家于瓜州。太宗平薛延陀诸部,于安西、北庭置都护属之,分同罗、仆骨之人,置沙陀督府。”<sup>⑧</sup>这种观点早在宋代时就已经遭到欧阳修的质疑,他于《新五代史·庄宗纪》上云:“然予考于传记,其说皆非也。夷狄无姓氏,殊邪,部族之号耳,拔野古与殊邪同时人,非其始祖,而唐太宗时,未尝有沙陀府也。唐太宗破西突厥,分其诸部,置十三州,以同罗为龟林都督府,仆骨为金微都督府,拔野古为幽陵都督府,未尝有沙陀府也。”<sup>⑨</sup>这种观点的错误可从两方面说明:(一)从从属关系上说,沙陀属西突厥统治,而同罗、仆固则属东突厥强部;(二)从地理位置而言,沙陀位于东部天山,而同罗、仆固位于漠北,两者是风牛马不相及的。

第四,沙陀源自粟特。钱伯泉、李树辉即持此

收稿日期:2008-02-27

基金项目:本文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沙陀研究”(05BZS012)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王旭送(1974-),男,山东平度人,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历史学硕士,主要从事新疆地方史及中国史学史研究。

说。钱伯泉认为:“沙陀突厥应是投归突厥,自成部落,由经商而改营游牧的粟特人部落。”<sup>⑩</sup>李树辉据《新唐书·沙陀传》认为:“处月也便是沙陀。沙陀即粟特。”<sup>⑪</sup>两位先生主要根据语音对转及沙陀人的体貌特征作此论断,尚无可靠史料佐证。

第五,沙陀源自突厥乌古斯。前苏联学者巴托尔德持此观点。其《中亚突厥史十二讲》云:“蒙古地区的突厥乌古斯有一部分迁到中国东突厥斯坦以后,中国人称为沙陀(Să-to),即草原居民之意,这一批突厥人早在公元9世纪初期就据有别失八里城(今新疆吉木萨尔县破城子),其后由于西方自己同族人的压迫,只得继续向东进入中国领土内,参加了在公元9世纪后期中国爆发的内乱。”<sup>⑫</sup>此种观点,不知何据。

第六,沙陀来源多元。张西曼、朱绍侯持沙陀来源二元论:张西曼认为“沙陀—萨尔特(缠回)就是回纥和大月氏的混合种……沙陀的母系主要为大月氏……父系主要为回纥”<sup>⑬</sup>;朱绍侯认为“沙陀是西突厥别部,是由大月氏土著和回纥人混合形成的”<sup>⑭</sup>。持沙陀来源多元论者比较多,概其要者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徐庭云于《内迁中原前的沙陀及其族源》认为,史籍中记载的“沙陀的重要族源是西突厥,这无疑是正确的”除此外,“其族源起码还应包括突厥、回纥、粟特三个主要的民族成分,每一民族之中,又包括若干部落”<sup>⑮</sup>;蔡家艺认为,“沙陀”一称,“主要是指以处月部为主,包括处密、射脾二部在内的游牧群体”<sup>⑯</sup>;郭平梁认为,沙陀渊源于处月、处密、射脾部<sup>⑰</sup>;宋肃瀛认为,沙陀是以射脾部为主,与留居高昌北山的各个部落结合而成的<sup>⑱</sup>。笔者认为来源多元论只适用少数情况比较特殊的民族,如裕固族等,但不适用于沙陀。持沙陀来源多元论者其实是把沙陀的组成成分与沙陀的来源相混淆,笔者认为不妥。绝大多数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都会不同程度地同化、融合其他民族成分或部落,但是这些被同化、融合的民族成分或部落只能算该民族的“流”,而不能算作“源”。如长江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在其东流过程中,又汇入岷江、嘉陵江、汉江等,但我们绝不会把岷江、嘉陵江、汉江的源头作为长江的源头<sup>⑲</sup>。

第七,沙陀源自处月。这种观点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持此说者主要依据的是《新唐书》卷二一八《沙陀传》中的一段史料:“沙陀,西突厥别部处月种也……处月居金娑山之阳,蒲类之东,有大碛,名沙

陀,故号沙陀突厥云。”<sup>⑳</sup>其后的胡三省在《通鉴考异》也持此说<sup>㉑</sup>。后世学者大多持这种观点。王仲举云:“后唐的祖先,西突厥别部处月部落之后,驻帐沙陀碛,因此人称之为沙陀突厥。”<sup>㉒</sup>林幹云:“沙陀原为西突厥处月部,西突厥强盛时,处月与西突厥别部杂处,分据伊丽河流域,后西突厥衰乱,处月徙居蒲类海之东,其地有大碛,名沙陀,故号沙陀突厥。”<sup>㉓</sup>林惠祥云:“沙陀突厥原为西突厥之处月部,故其姓曰朱邪,实即处月异译也。”<sup>㉔</sup>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云:“沙陀原名处月,为西突厥别部。”<sup>㉕</sup>江应梁主编《中国民族史》云:“沙陀为西突厥处月部,又称朱邪。‘处月’、‘朱邪’为同音异译,皆为突厥语‘沙碛’之意。”<sup>㉖</sup>刘义棠云:“沙陀为西突厥处月部,又称朱邪,后并以朱邪为姓……朱邪、处月乃为突厥语沙碛之义,而沙陀却为汉语之称。”<sup>㉗</sup>周伟洲云:“沙陀原为西突厥别部……其源于西突厥处月部。”<sup>㉘</sup>樊文礼则将沙陀来源细化到处月的分支——朱邪部,他在《沙陀的族源及其早期历史》一文中云:“沙陀的族源是西突厥别部处月部中的朱邪部落。朱邪是沙陀最早的部族名。”<sup>㉙</sup>

在沙陀来源诸说之中,持沙陀源自处月说占主流,而持沙陀来源多元说者亦将处月作为沙陀的重要源头,持粟特说的李树辉也以“沙陀即处月”为其立论前提。笔者认为,在沙陀早期历史中,沙陀与处月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部落,沙陀应源自射脾。

学术界对于民族族源的研究一般依据考古学、语言学、历史学三种方法<sup>㉚</sup>。笔者在此主要运用历史学的方法,并结合相关考古资料,来探究沙陀的来源。

## 二、早期沙陀与处月为两个不同部落

关于沙陀与处月的关系,学者多囿于《新唐书·沙陀传》的相关记载,认为两者为一。元代耶律铸则在此基础上有更深入的论述,其《涿邪山诗》云:“涿邪山者,其山在涿邪中也。涿邪后声转为朱邪,又声转为处月。……处月部居金娑山之阳,皆沙漠碛鹵地也,……即今华夏犹呼沙漠为沙陀,突厥诸部遗俗至今亦呼其碛鹵为朱邪,又声转为处月,今又语讹声转为川阙。”<sup>㉛</sup>古人的这些观点对后世学者影响甚大。黄文弼即云:“处月”部姓“朱邪(或称朱耶)”,“朱邪”、“处月”皆一声之转,突厥语意为“沙碛”<sup>㉜</sup>;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亦云:“沙陀原名处月,为

西突厥别部。……唐代文献将沙陀原来的名称处月,译写成‘朱邪’,作为沙陀统治者氏族的姓氏。”<sup>③</sup>蔡家艺也认为上述说法“大体可信”<sup>④</sup>。显然,他们普遍认为“沙陀”、“处月”、“朱邪”虽称呼不同,但其内涵是一致的。

其实,早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岑仲勉先生就在其大作《隋唐史》中对这一结论提出了质疑:(一)“哥舒翰所领诸蕃兵,朱邪与沙陀分为两部(见廿七节)”<sup>⑤</sup>;(二)“只看《新·传》太宗时有处月朱邪阙俟斤阿厥,《新·纪》永徽二年有处月朱邪孤注,同时复有射脾俟斤沙陀那速,处月、朱邪往往连称,朱邪不能概处月,盛昱阙特勤碑已举其证”<sup>⑥</sup>。岑先生通过分析,其实已经表明了他的观点:(一)处月、朱邪非一声之音转;(二)早期沙陀、处月是二非一。岑先生所论甚确。然岑先生的论证并未引起学界太多注意。

下面笔者将在岑先生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早期沙陀、处月为两个不同部落”的观点。

首先,我们分析一下处月与朱邪之间的关系。《新唐书·沙陀传》载:“贺鲁来降,诏拜瑶池都督,徙其部庭州之莫贺城,处月朱邪阙俟斤阿厥亦请内属”《旧唐书·高宗传》载:“显庆元年八月……左卫大将军程知节与贺鲁所部哥逻禄获刺颌发及处月预支俟斤等战于榆幕谷,大破之。”从上述引文来看,朱邪阙俟斤、预支俟斤分别代表处月的两支部落。则朱邪乃处月下属部落之一无疑。

关于沙陀部落早期活动的记载甚少,唯有《新唐书·沙陀传》中有一详细记载:“永徽(650-655)初,贺鲁反,而朱邪孤注亦杀招慰使,连和引兵据牢山。于是,射脾俟斤沙陀那速不肯从,高宗以贺鲁所领授之。明年,弓月道总管梁建方、契苾何力引兵斩孤注,俘九千人。”在这段话中,处月属部之一的朱邪与沙陀两个部落同时并称,而且这两部落在“贺鲁反”这一问题上,态度截然不同:一方站在唐朝一边,“以贺鲁所领授之”;而另一方则以逆唐而遭首领被斩、九千人被俘的悲惨结局。由此我们可以断定,沙陀、处月是两个不同的部落。退一步说,两者顶多是同属阿史那贺鲁统辖,地理位置比较接近,关系相对密切的两个部落。

除了文献记载之外,我们从出土的一些墓志、文书中也发现了相关佐证。2004 年春,洛阳邙山出土了唐代名将李释子墓志。志石青石质,广 73、宽 73、厚 19 厘米,志文楷书 32 行,行满 32 字,志文由

中散大夫褚秀撰。现逐录相关内容如下:“久视初(700)(李释子)出牧盐、甘、肃州刺史,又充玉门军大使,又充营田、处月等大使。”<sup>⑦</sup>在李释子出任以上官职之时,沙陀部的首领沙陀金山正在墨离军讨击使任上,直到长安二年(702),进为金满州都督,累封张掖郡公<sup>⑧</sup>。沙陀金山所任墨离军讨击使在当时归属瓜州府管辖,则沙陀金山所统之沙陀部当不在李释子所任之“处月大使”管辖范围内,从地理范畴来讲沙陀与处月应不是同一部落。

又 20 世纪初日本大谷探险队掠走的大批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一件《开元十六年朱邪部落请纸牒》(大谷 5840)。兹逐录全文如下:

大谷 5840《朱邪部落请纸牒》(前欠)

- 1 开元十六年八月十六日典[渠][思]忠牒
- 2 首领阙俟斤朱耶波德
- 3 付司楚珪示
- 4 十九日
- 5 八月十九日录事礼受
- 6 录事参军沙安付
- 7 检案。沙白。
- 8 十九日。
- 9 牒检案连如前。谨牒。
- 10 八月 日史李艺牒
- 11 朱耶部落所请次案共
- 12 壹伯张状来。检到不
- 13 虚。记谿,沙安白。
- 14 十九日
- 15 依判。谿。希望示。
- 16 十九日
- 17 依判。谿。球之示。
- 18 十九日
- 19 依判。楚珪示。
- 20 十九日
- 21 开元十六年八月十九日
- 22 史李艺
- 23 录事参军沙安
- 24 史
- 25 八月十九日受,即日行判。
- 26 录事礼检无稽失
- 27 录事参军 自判
- 28 案为朱耶部落检领纸到事。<sup>⑨</sup>

这是一件朱邪部落首领朱耶波德上西州都督府请领纸牒,牒末有朱耶波德的签署,时间是开元



十六年(728)。作为未经人为篡改的原始档案,吐鲁番文书的可靠性应是高于其它文献的。从这件文书可以看出,至迟在开元十六年的时候,“朱邪”还仍然以一个部落的名义出现。而据《全唐文》卷二八四张九龄《敕伊吾军使张楚宾书》,距开元十六年不久的开元二十二年(734),有沙陀部落居于伊州。原文如下:“近得卿表,知沙陀入界,此为刘涣凶逆,处置狂疏,遂令此蕃,暂有迁转。今刘涣伏法,远近知之,计沙陀部落,当自归本处。”<sup>④</sup>在相近的时间内,出现两个身处不同地区、名称截然不同的部落:朱邪和沙陀,则处月和沙陀在公元730年左右仍是两个不同的部落。

### 三、沙陀源自射脾

既然早期沙陀与处月是二非一,那么沙陀源自何处呢?笔者认为,沙陀源自射脾<sup>⑤</sup>。唐朝初期冠以“沙陀”的史料仅有一处,见于《新唐书·沙陀传》,现复引之:“永徽初(650),贺鲁反,而朱邪孤注亦杀招慰使,连和引兵据牢山。于是,射脾俟斤沙陀那速不肯从,高宗以贺鲁所领授之。明年,弓月道总管梁建方、契苾何力引兵斩孤注,俘九千人。”对于这段史料中沙陀那速冠以射脾俟斤,有的学者认为射脾与沙陀有着较深的关系,但不一定具有紧密的血缘关系<sup>⑥</sup>。笔者认为欠妥,沙陀那速担任射脾部之俟斤,自当是射脾部人。查诸西突厥属部首领,决无一例以外部人担任本部首领之现象。即使唐朝在平定突厥,设置羁縻州府之时,也是“各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对于那些反唐部落,也是从本部落中选择首领,担任以该部所设羁縻州府的首长,亦无另选他部人做本部首长之例。故此笔者认为,沙陀那速既为射脾俟斤,则沙陀那速即为射脾部人,沙陀部落应源自射脾部。

对于沙陀与射脾的关系,岑仲勉先生从语音学角度进行了专门的论证。首先,岑先生认为射脾即活动于东部天山地区的“失毕”之异译<sup>⑦</sup>:“按贺鲁所通为失毕五姓及处月、处蜜等众。……失毕亦翻失卑。准此以推,射脾盖失毕之异译。……五失毕之长为俟斤。《新唐书·沙陀传》言射脾俟斤,又射脾即失毕之旁证。”<sup>⑧</sup>岑先生言“失毕亦翻失卑”甚确,然岑先生认为射脾亦即弩失毕,笔者认为欠妥。在阿史那贺鲁之前,沙钵罗蛭利失可汗时,其将所统突厥部落划分十部,五咄陆居碎叶之东,五弩失毕居碎

叶之西<sup>⑨</sup>。而阿史那贺鲁牙帐在西州直北的多逻斯川,其所统之五部均在天山地区<sup>⑩</sup>,两者地理位置根本不符。故笔者认为,阿史那贺鲁所统部“弩失毕”之“弩”为衍(吴玉贵亦持类似观点<sup>⑪</sup>)。其次,岑先生认为沙陀之语原即唐史中常见之“失毕”或“矢毕”:“沙陀之语原,有人以《阙特勤碑》文……之‘sadapyt’相比,按此词在唐史中经余证为常见之‘失毕’或‘矢毕’,但假使转译时读作sadavü(t),亦未始不可与‘沙陀’相对”<sup>⑫</sup>。综合岑先生上述论证可以看出,岑先生主张“沙陀”从语原上源自“射脾”。

射脾是唐朝初期活动在东部天山地区且具有较强独立性的一个部落。阿斯塔纳一七一号墓出土的《高昌延寿十四年(637)兵部差人看客馆客使文书》关于射脾活动的记载,是目前所知的射脾最早的活动。这是一件记载高昌麹氏王朝与突厥人往来的官方文书。现逐录相关内容如下:

[前缺]

1 次羈人赵头六、王欢儿貳人,付宁僧护,用看[珂]

2 勲苏弩胡鹿大官、公主时健大官

3 [付毛海龙],用看毗伽公主[寒]

(略)

9 [纒达官伍]日。次小张海柱,付康善财,用看坞耆耒射卑

10 妇儿伍日。令狐资弥胡,付王善祐子,用看尸不,殺旱大官

21 [看坞耆耒射卑妇儿伍日]。

次吕隆伯,付

(略)

33 伯儿,用看居,拙使伍日。次赵小儿,付[康善财],用看

34 坞耆耒射卑妇儿伍日。侍郎鞠延陀、[侍]讲辛武护

(略)<sup>⑬</sup>

这件文书第九行、二十一行、三十四行的“坞耆”为“焉耆”的异译,“射卑”也即“射脾”<sup>⑭</sup>。从这件文书可以看出,射脾是一个游牧于焉耆境内天山之中而且与高昌麹氏王朝来往比较密切的一个部落。根据相关文献记载,高昌延寿十四年统治西域的西突厥可汗是沙钵罗蛭利失可汗同俄设,则此时的射脾当归沙钵罗蛭利失可汗统治。

沙钵罗蛭利失可汗在位时期内忧外患交加、危机四伏,贞观十二年(638),支持欲谷设的部落拥立

欲谷设为乙毗咄陆可汗,西突厥内部发生分裂。十三年,“啞利失为其吐屯俟利发与欲谷设通谋作难,啞利失穷蹙,奔拔汗那而死。弩失毕部落酋帅迎啞利失弟伽那之子薄布特勒而立之,是为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既立,建庭于睢合水北,谓之南庭。东以伊列河为界,自龟兹、鄯善,且末、吐火罗、焉耆、石国、史国、何国、穆国、康国,皆受其节度。”<sup>⑩</sup>啞利失之后继位者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与乙毗咄陆瓜分西突厥汗国,游牧于焉耆附近的射脾当归属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统治。

贞观十五年,“咄陆可汗与叶护颇相攻击……咄陆于时兵众渐强,西域诸国复来归附。未几,咄陆遣石国吐屯攻叶护,擒之,送于咄陆,寻为所杀”,咄陆可汗杀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并其国之后,“自恃其强,专擅西域”<sup>⑪</sup>,整个西域为乙毗咄陆所统治,此时的射脾应转归乙毗咄陆可汗统治。

乙毗咄陆统辖下的射脾早期是否曾归阿史那弥射、阿史那步真具体统治,由于史料阙如,尚不得而知,但乙毗咄陆后期射脾是由其所立的叶护阿史那贺鲁具体统治。阿史那贺鲁统治天山东部时期进行过一系列反唐活动,射脾也追随阿史那贺鲁参与了反唐活动。高宗初年唐政府组织弓月道行军征讨阿史那贺鲁之前,首任庭州刺史骆宏义所上唐帝之疏为我们提供了证据,该疏云:“安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理有变通也。贺鲁保一城,方寒积雪,谓唐兵不来,宜乘此一举灭之。迁延及春,且生变,纵不率连诸国,必远迹遁去。且兵本诛贺鲁,而处蜜、处木昆等亦各欲自免,若留不进,彼与贺鲁合矣。今虽严冬风劲,兵苦鞭堕,又不可久留费边粮,使贼得坚党附、除死期也。请宽处月、处蜜等罪,专诛贺鲁,除祸务本,不可先治枝叶也。愿发射脾、处月、处蜜、契苾等兵,赍一月食,急趋之,大军驻凭洛水上为之景助,此驱戎狄功豺狼也。且戎人藉唐兵为羽翼,今胡骑出前,唐兵蹶后,贺鲁穷矣。”<sup>⑫</sup>在其后唐朝对西突厥诸部的招慰活动中,射脾部在其首领沙陀那速的领导下归唐,归唐后的射脾部获得了阿史那贺鲁叛乱前所领的权利,从而为其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对于沙陀的来源似可追溯到更早的年代,因为在西突厥统治西域之前,“伊吾之西,焉耆之北,傍白山”为铁勒诸部落游牧之地。在西突厥统治西域之后,这些铁勒部落几乎全部改用“突厥”族名,虽然他们同突厥的核心种姓阿史那氏关系亲疏不一,

但他们“族名相同,语言相近,风俗相似”是异姓突厥的有机组成部分<sup>⑬</sup>。射脾所处位置恰与这些突厥化的铁勒部落所处位置相吻合,故射脾极有可能源自这些突厥化的铁勒部落中之一部。芮传明从语音学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伊吾之西,焉耆之北,傍白山”的铁勒属部之“苏婆”(suo-b'uā)和射脾(dz'ia-b'jie)从语音来看极为接近,可以被看作为同一名称的异译,因此他断定,射脾源自西域铁勒部落中的苏婆部<sup>⑭</sup>。

注释:

- ①三朝指后唐、后晋、后汉;一国指北汉。
- ②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一七,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16页。
- ③关于沙陀与回纥的关系,笔者在另稿《沙陀与周边民族之关系》中有详细论述。
- ④樊文礼:《沙陀的族源及其早期历史》,《民族研究》,1999年第6期,第68-77页。
- ⑤和宁:《三州辑略》卷一,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资料室复印本。
- ⑥⑭薛宗正:《突厥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316,314页。
- ⑦陶懋炳:《五代史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7页;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15页。
- ⑧《旧五代史》卷二五《武皇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31页。
- ⑨《新五代史》卷四《庄宗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9页。
- ⑩刘维新主编:《新疆民族辞典》,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6页。
- ⑪李树辉:《哥逻禄新论》,《龟兹学研究》第一辑,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4-71页。
- ⑫巴托尔德著、罗致平译:《中亚突厥史十二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47页。
- ⑬《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文摘(新疆分册)》下册,兰州:甘肃省图书馆,1985年,第669页。
- ⑭中国史学会河南分会:《史学问题解答》,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73-74页。
- ⑮徐庭云:《内迁中原前的沙陀及其族源》,《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6期,第10-16页。
- ⑯陈佳华主编:《宋辽金时期民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第177页。
- ⑰郭平梁:《回鹘西迁考》,《西域史论丛》第1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4-41页。
- ⑱宋肃瀛:《回纥的由来及其发展》,《西域史论丛》第1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2-79页。
- ⑲苗普生:《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的民族融合和维吾尔族的

- 形成与发展》,《西域研究》,2005年第4期,第1-8页。
- ②③《新唐书》卷二一八《沙陀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153页。
- ②《资治通鉴》卷二七二“庄宗光圣神悯孝皇帝上”条下胡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879页。
- ②王仲犛:《隋唐五代史》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830页。
- ②林幹:《突厥史》,第129-130页,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 ②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下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33页。
- ②③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540、527页。
- ②江应梁主编:《中国民族史》中册,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年,第102页。
- ②刘义棠:《中国边疆民族史》,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1年,第300页。
- ②周伟洲:《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52页。
- ②樊文礼:《沙陀的族源及其早期历史》,《民族研究》,1999年第6期,第68-77页。
- ③参阅王明珂:《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第一部分《边缘与内涵》之第三章《民族史研究的边缘理论》,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第61-94页。
- ③①《双溪醉饮集》卷二,辽海丛书本。
- ③黄文弼:《古楼兰国历史及其在西域交通上之地位》,《西北史地论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91页。
- ③陈佳华主编:《宋辽金时期民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第177-178页。
- ③③岑仲勉:《隋唐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58、514页。
- ③张乃翥:《裴怀古、李释子、和守阳墓志所见盛唐边政之经略》,《西域研究》,2005年第2期,第25-33页。
- ③③《大谷文书集成》第三卷,京都:法藏馆,2003年,第209-210页。
- ④薛宗正先生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对沙陀与处月为一的观点提出质疑,在其大作《突厥史》中将处月与沙陀部落分开论述,而且在缺乏相关史料佐证基础上提出“沙陀似即射脾部”观点,笔者拜读之后倍感受益。《突厥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316-317页。
- ④⑤芮传明:《天山东部地区铁勒部落考:〈隋书〉铁勒诸部考》,《铁道师院学报》,1989年第1-2期,第46-54页。
- ④“失毕”在不同文献中称呼不同:《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唐纪十五》作“失毕”,第6256页;《新唐书》卷一一〇《契苾何力传》作“卑失”,第4119页;《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突厥传》下作“弩失毕”,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186页;《通典》卷一九九《边防十五》作“毕矢”,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459页。
- ④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6页。
- ④《新唐书》卷二一五下《突厥传》下,第6060页。
- ④《册府元龟》卷九九五《外臣部·交侵》,第11685页。
- ④吴玉贵于《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云:“弩失毕部此时不属贺鲁管辖,且弩失毕本有五姓,加处月、处蜜、姑苏、哥逻禄四姓,已有九姓,不当合称‘五姓’,此姑存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11页。
- ④岑仲勉:《隋唐史》,第513页注释③。
- ④《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四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132-135页。
- ④参阅钱伯泉:《从传供状和客馆文书看高昌王国与突厥的关系》,《西域研究》,1995年第1期,第87-96页;芮传明:《天山东部地区铁勒部落考:〈隋书〉铁勒诸部考》,《铁道师院学报》,1989年第1-2期,第46-54页。
- ⑤⑤⑤《旧唐书》卷一四四下《突厥传》下,第5184、5184、5185页。
- ⑤《册府元龟》卷三六六《将帅部·机略》,第4352页。

## The New Viewpoint of SHATUO's National Source

WANG Xusong

(Institute of history studies ,Xinjia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 Xinjiang Urumqi , 830011)

**Abstract:** SHATUO originally is a small and weak nationality ,who activity in Northwestern Region in early time. As a Small and weak nationality ,SHATUO does not have the tradition of Recording history ,in the same time , related history book has not accurately anddetailed record. These reasons cause the difference in SHATUO's national source. The author believed that the mainstream viewpoint "Shatuo comes from CHUYUE" is wrong ,SHATUO's national source is SHEBI.

**Key words:** Shatuo ; origin ; Chuyue ; Shebi

[责任编辑:李 蕾]